

穿越时空的变革之声

编者按

在历史的进程中，变革的脚步从未停歇，它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本期“传统文化”版面带你回顾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革。以期鉴古知今、以史为镜，汲取今天变革的智慧与力量。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运紧密相连。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在^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出自《鬼谷子》：“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意思是，能够洞察历史大势的是明白人，能够顺应历史大势的是明智者，在此基础上能够驾驭大势的人就会成为引领时代潮头者。

成都的武侯祠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讲的就是诸葛亮对治理蜀国的形势判断。

公元207年，暂居新野的刘备接受徐庶的建议，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诸葛亮。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成就大业描绘了一条包括内政、外交、军事在内的路线，未出茅庐就判断出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趋势。这篇对策，就是人人熟知的《隆中对》，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

《隆中对》之所以闻名天下，并不是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天纵神授之才，而是他紧紧立足对现实的科学分析。所以诸葛亮在《将苑·兵势》中明确讲道：“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

淝水之战后，苻坚统率的前秦瓦解，鲜卑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机复国，史称北魏。到了孝文帝拓跋宏时期，他意

识到国家发展必须要面对新的形势进行变革，而新的形势就是经过南北朝的征战纷乱之后，民心思定、民族融合。于是不失时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旨就是推行汉化运动，比如将鲜卑姓氏改为汉族姓氏，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顶住重重压力迁都洛阳。

在孝文帝审时度势的改革下，饱经战乱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从更长远的影响来看，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有悲观的思想，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一家店铺的阁楼上，借着灯光，写下一封长信，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这封在微弱灯光下写出的长信，就是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一扫笼罩在同志们心头的阴霾，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指出了革命前行的光明之路。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瑞金成立。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

变。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运将会更加紧密相连。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因为，这就是人间正道。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察势者明 趋势者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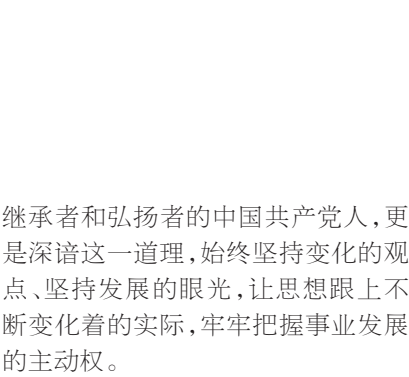
▲ 书法

李福林（国电电力）



▲ 插画 商鞅立木为信

张曼雪（平庄煤业蒙东能源）



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深谙这一道理，始终坚持变化的观点，坚持发展的眼光，让思想跟上不断变化着的实际，牢牢把握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回望百年，从冲破思想桎梏，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到跟上时代步伐，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再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鲜明品格。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变化者 乃天地之自然

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原王朝曾经使用过各种手段，如和亲、筑长城、武力征讨等。中原王朝有盛衰的不同，游牧民族政权有强弱的差别，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性质的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就有种种区别。因此，死守某个不变的方法，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恰当的对策。这就是“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

苏轼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

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无论治事、治人、治法，都需要建立在治时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曾或多或少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变革，如春秋时期管仲改革，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宋王安石变法……各种制度之所以要因革损益、不断变化，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坚持与时俱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数千年历史反复验证的兴国之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

对古代变法运动中吏治腐败的反思

从春秋时齐国管仲实行“三其国而伍其鄙”的新算法起，到十九世纪的戊戌变法，中国古代史载有名的变法二十次，可以说古代变法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全过程。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数十次变法大多不是真正意义上成功的改革。一些变法运动哗然开场，最后黯然收场，吏治不成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重要因素。思考这方面的教训，也许对今天现实中的改革不无裨益。

思考之一：制度性约束的缺乏，导致各级官吏借变法与民争利

西汉末年，王莽以变法者的面目出现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王莽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大小小的执行变法的官员借变法之名行掠夺之实。

如王莽规定限制土地买卖，定期根据农户人口的多少重新分配，把有些地主多余的土地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收归国有后，再分配给无地农民。可执行这项措施的大小官员，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巧立名目地划归自己名下，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为了给变法提供经济动力，王莽下令在长安、洛阳、邯郸、

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负责税收和除贷，实际上是改革工商和税收制度，平抑物价，抑制商人。但是，负责改革工商的官员借变法之名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如洛阳的张长叔、邯郸的薛子仲等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家财“巨亿”。

借变法以营私的不法之徒史不绝书，正是这些人的作为，败坏了变法的名声，对于这些人，国家又没有相关的法令去制约他们，使原本满有希望的变法成为万民所指的齷齪事业，按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变法一旦失败，紧接着的就是社会风暴。

思考之二：靠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管控手段，致使人亡政息

战国时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都以“严”著称。商鞅为了“造威”，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子贾处以重刑，有何法律依据？全是商鞅“独断”，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既然是人治，人死则法亡，商鞅最后逃亡时，秦国没有一家旅店肯收留他，原因是没有“商君”的令牌。吴起相楚后，短期内就强大楚国，靠的是什么？亦是靠人治吏，以“严”，以“暴”

治国，表面上好像是以“法”治之，其实错了：如果真以法治国，以法治吏，那这种“法”就有连续性和不可替代性，不会因变法者的死亡而中断。可吴起也好，商鞅也好，都因变法死于非命，他们一死，变法停止，这就充分证明他们不是以法治吏、治国，只不过是野蠻、残忍的人治手段，然后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去强制维持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回头看来，历朝历代在变法实践中，对各级执行变法的官员采取过一些措施，可问题是：执行管控、惩治的手段和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手段，没有长久性、延续性和不可替代性，只是人治的一种补充，所以变法者治吏不管有多严都不能解决官吏贪腐的痼疾。

思考之三：无法产生一支坚守变法理想的过硬的官员队伍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法，在执行程序上，都是从上而下，由顶层设计，郡县级官吏层层执行。因此，政府中的中、下层各级官员成了变法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但是，对于变法的最终理想，变法的设计者与各级官吏往

往大相径庭。变法的设计者怀有强烈的理想抱负，各级官员则被动执行，或者出于个人的利益需要成为变法的鼓吹者和参与者。由于缺乏主动的参与意识，又没有监督和约束，面对强大的物质利益，人性的弱点往往驱使各级官吏置自己的社会责任于不顾，疯狂贪敛，肆意掠夺。因为没有一支上下同心的、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and 使命感的官员队伍能健康地把变法推行下去，变法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因没有造就一支善于变法的官员队伍，吴起死，楚国变法终止，旧贵族疯狂报复；商鞅死，以太子老师公子贾、公子虔为首的保守势力则全面复辟；王莽的“变法”队伍由于倒行逆施，激起农民起义；王安石失势后，一夜之间新法被司马光诸人废得干干净净；张居正尽管以“严”著称，但其尸骨未寒变法队伍中的许多人就纷纷改换门庭，变法也烟消云散。正因“吏治无法”“吏治无功”使许多次变法功亏一篑，社会也陷入“官逼民反”的周期性的社会动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传统文化知多少

历史上有名的变法

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为了取得优势地位，一些强大的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进行征战，争夺霸主地位。

其中，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执掌国政，他采纳管仲的建议，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齐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提高。齐桓公打着“尊天子，攘四夷”的旗号，号令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增强。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各诸侯国统治者实行变法改革，确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以求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取胜。

在各国的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大。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商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提出确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理；严明法度，整止私斗。在经济上，提出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统一度量衡。在军事上，提出奖励军功，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改革

4世纪后期，游牧在阴山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迅速崛起，建立北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北方各族人民长期杂居，民族聚落已不多见。内迁的各族在生产、生活和习俗上，与汉族已无明显区别。而鲜卑拓跋部因内迁较晚，仍保持鲜卑族的习俗，要治理好广大的北方地区不免困难重重。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立志用文治移风易俗。他力排众议，494年迁都洛阳，把百余万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迁到中原。他进一步推行汉化措施，规定官员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以汉服代替鲜卑服；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联姻；采用两汉、曹魏的官制、法律等。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交融，也增强了北魏的实力。

王安石变法

北宋的政治风气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下。在边疆战争中，北宋屡战屡败，每年被迫送出大量钱物。由于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不断膨胀，到北宋中期，政府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涉及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他们希望通过变法，摆脱统治危机，实现富国强兵。在经济上，王安石变法主要实施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田水利法，从而限制官僚特权，增加政府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在军事上，变法推行保甲法，把农村人口编制起来，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变法收到一些成效。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但是，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消息传出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时局的危险和变法的紧迫性，呼吁变法救国。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决心变法。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随后，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裁撤冗官冗员，允许官民上书言事；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发展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新式学堂裁减绿营，训练新式军队等。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他们掌有实权，阻挠和破坏变法的贯彻。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人士，废除变法诏令。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出逃。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捕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来源：《中国历史》）